第56卷 第3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6, No.3
2019年5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9

经 济 学 研 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刘 伟 范 欣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新的经济增长现象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在世界经济前行中不断发展。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兴衰起伏,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能否在长期中实现落后对先进的赶超进而经济发展水平趋同?这是经济增长理论一直试图予以回答的重要问题。经济增长理论从诞生之日起,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历经沉浮变迁,可以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流变,近而探寻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以试图阐释新的经济现象中的一般性规律,并借此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内在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F 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9)03-0035-19

经济增长理论根植于世界经济发展现实之中,试图阐释经济现象背后的一般性规律。时代在发展,经济增长理论也在不断修正与突破。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19世纪开始,全球经济开启,整体呈现上升趋势。① 在此进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经济危机现象的出现,有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顺利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有的国家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停滞,陷入"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各国经济的沉浮变迁中,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能否在长期中实现落后对先进的赶超进而经济发展水平趋同?这是经济增长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在尝试着回答和解决的理论难题及现实问题。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

15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国家开始萌芽和生长,但同时期的英国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欧洲大陆。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市场范围不断扩大,自17世纪以来,英国的农业和工业迅速发展,经济从停滞状态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重商主义学说在此阶段产生,强调如何快速实现商业资本增加和货币资本积累,并认为贵金属(如金银等)的多寡是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重商主义将经济增长与货币财富积累视为等同,且忽视了国内农业发展的重要性。18世纪开始,伴随着农业革命不断发展,重农学派在作为农业大国的法国开始出现。以魁奈(Quesnay)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也为后续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生,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在欧

收稿日期: 2019-03-20
作者简介: 刘伟,男,山东蒙阴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① 根据Boltho and Toniolo的统计资料显示,1500—1820年期间,世界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04%;1820—1900年期间,世界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1900—2000年期间,世界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这表明世界经济在19世纪以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世界经济进入上升期实际上也仅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参见Boltho, A. and Toniolo. G., "The Assessment: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chievements, Failures, Lesson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99, 15(4): 1—17.

洲的发达国家应运而生。关于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密(Smith)、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Ricardo)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批判重商主义的研究基础之上,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寻找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斯密明确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① 该理论虽重点关注国民财富的性质,但对资本内涵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斯密所提出的劳动分工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为后续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② 面对英国经济的急剧变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马尔萨斯重在关注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将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③ 李嘉图则重点关注分配领域,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是产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将可能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的停滞。④ 穆勒(Mill)在基本经济增长方程下,探讨人口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生产技术在不同情形下的动态变化,认为若综合考虑土地报酬递减规律、马尔萨斯人口规律、利润率下降规律等,人类社会将处于静止状态。⑤

同期,马克思(Marx)⑥在批判和继承英法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体系,构建了第一个两部类增长模型,实现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马克思通过对两部类增长模型分析发现,社会总资本的分配比例会通过影响两大部类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资本有机构成是影响总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资本、劳动、科学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要想实现经济持久平衡的增长,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是关键因素。可以说,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创建了一个科学而又严密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为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相比,马克思将经济增长问题数理化,构建了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第一个两部类增长模型。与哈多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等单部门模型相比,该模型同时兼顾了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等方面的问题,将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作为动态量来实现长期动态分析,这将显得更加的全面系统和贴合现实。

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普法战争的爆发,价格开始进入持续下降期,这对既有的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学者们的研究重心从经济增长转向社会改革和福利、资源配置效率等,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开始步入“边缘化”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专业领域的不断细化,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也得以扩展,但也有相当多不一致的声音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期间,由于战争等因素导致制度框架的破裂,不少经济学家重在关注公共政策的影响等。马歇尔(Marshall)关注的焦点与

① 事实上,休谟(Hume)也对经济增长进行了论述,认为产出是劳动、土地和制造业的函数,劳动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在于人类动机的驱动。但与斯密的《国富论》相比,《国富论》更为系统和丰富,影响力更加深远。故一般将斯密视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参见 Smith, A.,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

② 在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农学派等相关经济思想影响下,斯密在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是针对地理大发现后,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而作的著作,故其经济增长理论重在强调分工、资本积累等因素。

③ 始于 1793 年的英法战争,仅在 1802 年停战一年,这将为马尔萨斯检验人口理论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速在 1780 之后开始提高等,这些均为其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假设前提。参见 Malthaus, T. R.,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W. Pickering, 1986.

④ Ricardo, D., 1817,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⑤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版。

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不同,仍在经济增长方面,认为一国的实际总收入取决于工人的数量、工人的平均效率、财富数量、自然资源丰裕度、生产技术水平和公共安全状况等。① 一定意义上说,马歇尔仍将经济增长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同时期的多数经济学家则开始转向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及其动力学分析,如人口因素、技术因素等。在人口变动方面,面对先进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特征,学者们从最优人口观、人口变迁等视角加以阐释。② 在此期间,人口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成熟阶段,特别是大萧条时期的英国、瑞典和美国等先进工业国家最为关注最优人口问题。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死亡率的大幅提高、净出生率的下降等现实问题,Reddaway 指出人口增长的迟缓和下降将会影响到资本供给、技术进步、年龄构成、生产规模、国际贸易等,进而给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带来不同的影响。③ 瑞典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口净增长率也出现急剧下滑,到中期为止,瑞典人口净增长率在先进工业国家中排名最末,引发全国性的人口大讨论。若支持生育控制等人口限制方式,这将是增加人均实际收入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措施。④ 在此阶段,部分学者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长期动态变迁来分析最适宜人口密度,其实质也是在探讨人口变迁问题。⑤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数据的日益翔实、分析工具的不断精进等,针对拉丁美洲、亚洲等相对落后工业国家的人口问题研究也有出现。⑥ 一定程度上看,这一时期学者们针对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人口的动力学、人口净增长率等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但这均是建立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的经验分析基础上。面对 1945 年之后世界人口形势的演变,人口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精进与修正。在技术进步方面,创新是一种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可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⑦ 从多国长期各主导部门的先后衰退进程来看,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⑧

囿于经济增长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及其现实经验数据的缺失等,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在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二是经济增长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动力学。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从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人口数量等角度来探讨产出的影响因素,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则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从生产技术、创新等视角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虽研究视角有所差异,但其实质均在探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这些理论思想将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基于此,需进一步运用现代工具方法将其数理化、模型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因此产生。那么,何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目前暂无明确界定。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时代变迁来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应是在历经“静态的插曲”后于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复兴的经济增长理论;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流变来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应是在继承和吸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等相关思想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来看,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采取定性分析,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是运用现代工具方法探讨经济增长的规律性问

---

①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s., London: Macmillan, 1920.

② 数据来源于《Population Index》。数据显示,在此期间,人口净增长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具体来看:1935—1939 年英国、瑞典、美国的人口净增长率分别为 0.79、0.78 和 0.96;1955—1959 年英国、瑞典、美国的人口净增长率分别为 1.13、1.06 和 1.73;1975—1979 年英国、瑞典、美国的人口净增长率分别为 0.83(1978)、0.81 和 0.86(1978)。

③ Reddaway, W. B., *The Economics of a Declining Popul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9.

④ Wicksell, K., *Lectur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1934.

⑤ Carr-Saunders, A M., *World Populat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6.

⑥ Antesy, V.,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 London: Longman Green, 1936.

⑦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⑧ Kuznets, S., *Secular Mo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 Their Nature and Their Bearing upon Cyclical Fluctat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30.

题。概括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应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兴起,针对现代经济增长现象,采用现代工具方法来试图阐释经济增长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① 狭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是指从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开始,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思想,采用现代工具方法分析经济增长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从英国转移至美国,经济增长分析又重新回到了舞台的中央。伴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新经济危机的出现等,新经济增长现象也不断涌现。③ 这些新现象的出现,也给经济学家们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经济学家们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开始从多元视角加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在此期间开始复兴。特别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本文将遵循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主线,按照时间脉络或研究主题差异等进行阐释。本文研究框架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建立在技术外生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三节介绍建立在技术内生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第四节介绍建立在制度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五节介绍建立在结构变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第六节介绍建立在需求因素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七节介绍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第八节是本文的小结与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技术外生与经济增长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可能会再次上演。为此,在经济系统脆弱性下探讨经济能否长期均衡增长尤显重要。哈罗德于 1939 年和 1942 年分别发表了《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文章》和《走向动态经济学》,多马于 1946 年和 1947 年分别发表了《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和《扩张与就业》,标志着形式化增长模型开始建立。④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构建,不仅是经济增长问题作为单独的经济问题首次被专门进行理论研究,也是数理经济方法开始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使用,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哈罗德模型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通过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存量的折旧不变、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系数的性质等进而研究产出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国经济只有当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同时相等时,才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多马模型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重在强调投资的双重性,认为长期上存在一种实际产出增量与最高潜在产出增量相等、总产量的均衡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相等的均衡增长率。哈罗德-多马模型克服了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从供给与需求相结合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但由于三种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同,想实现一致很难。这种过分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刃锋

① 库兹涅茨(Kuznets)在《现代经济的增长:事实和思考》中针对现代经济增长总结出六大特征:(1)人均产量和人口的高增长率;(2)生产率的高速增长;(3)经济结构的转变;(4)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迅速改变;(5)增长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大;(6)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

②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将采用广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概念加以分析。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罗万象,在此我们无法一一涉及,仅选择部分有典型代表性的增长理论加以论述。

③ 1973 年和 1981 年两次石油危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经济波动,20 世纪 80 年代低增长下高失业率、高赤字和高债务问题等。

④ Harrod, R. F.,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1939, 49: 14—33; Harrod, R. F.,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Policy*. Macmillan, London: Greeenwood Press Reprint: 28, 1942; Domer, E. D., “Capital Expansion, Rate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 *Econometrica*, 1946, 14(2): 137—147; Domer, E. D., “Expansion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7, 37: 34—35; Rostow, W. W., *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With a Perspective on the Next Century*, OUP USA, Reprint, 1993.

式增长”,均衡路径不具有稳定性。

哈罗德-多马模型问世后的十年里,形式化增长模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并未引发大规模的探讨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此期间,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暗含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假设前提刚好与现实情况相反。纵观战前的先进工业国家,其经济增长势头并未因此深受影响。美国虽经历朝鲜战争和实施马歇尔计划,但经济活力强劲,进入了大规模消费时代。欧洲经马歇尔计划援助,进入欧洲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48—1952 年期间工业生产增长了 35%,农业生产超出战前水平。日本在良好的国际经济形势下进行民主改革,经济开始快速复兴并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被称为神武景气。① 面对这一国际经济形势的非预期性变化,学者们也将研究转向探讨经济体内生的力量,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应运而生。

面对哈罗德不稳定性与现实经验的巨大差距问题,新古典增长模型试图从要素替代出发,寻找稳定的增长路径。② 索洛(Solow)和斯旺(Swan)突破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系数的假设前提,将凯恩斯的总量分析与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相结合,在边际产出递减、规模报酬不变、稻田条件等基本条件下,建立了一套新的动态均衡模型。③ 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由于投入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经济将趋于稳态,长期上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将趋于零。经验事实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并未按照索洛模型走向经济趋同,相反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针对索洛模型没有解释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可能出现的动态无效率问题,卡斯(Cass)、库普曼斯(Koopmans)通过将拉姆齐(Ramsey)的研究引入模型中,进一步将储蓄率内生化,利用连续时变函数,在市场出清的状态下从消费者和厂商的角度分析了消费率与资本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被称之为卡斯-库普曼斯-拉姆齐模型(简称拉姆齐模型)。④ 虽然拉姆齐模型回答了最优储蓄率受到贴现率、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但由于人的寿命是无限期的假设前提而备受质疑。为此,戴蒙德(Diamond)通过假设家庭人员存在新老交替现象,将个人生命周期分为青年期和老年期,从离散角度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储蓄、消费、产出等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⑤

考虑到发明、创新和技术的重要性,形式化增长模型也对此进行了相应地讨论,但基本都回避了熊彼特提出的大量创新都是大规模、内生、非连续性的论断。换言之,在探讨这一主题上,基本上还停留在技术外生的假设前提之下。阿罗(Arrow)构建了“干中学”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公共产品只是具有“外溢效应”等,作为其基本假设。⑥ 认为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不进行投资的厂商也可以在学习中提高生产率。谢辛斯基(Sheshinski)则对阿罗模型的结构进行了简化和扩展,提出了一个简化的阿罗-谢辛斯基模型,认为均衡增长率取决于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

---

① 1968 年日本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大经济体。1979 年日本 GDP 总量达到 1.01 万亿美元。1987 年日本 GDP 总量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② 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英国在此期间有高工资和煤炭资源丰富两个重要特点,这就使得生产者更愿意以使用较少的劳动力,而多投入物质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要素替代在经验事实中存在。

③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 65—94; Swan, 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1956, 32(2): 334—361.

④ Cass, D.,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5, 32(3): 233—240; Koopmans, T. C.,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5; Ramsey, F.,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Economic Journal*, 1928, 38: 543—559.

⑤ Diamond, P., “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5, 55(5): 1126—1150.

⑥ 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 155—173.

率,但也取决于学习效应。① 如果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为零或出现负值,长期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或者出现负增长。宇泽弘文(Uzawa)通过建立一个包含有物质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试图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角度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②

但是,技术外生下增长模型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担忧,并未很好地预见到 20 世纪中期后的世界经济进程。虽有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出现,但也并不能有效解释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荣背后的根本原因。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1974—1975 和 1979—1982 年两次小规模的经济危机,也明显与技术外生增长模型所假定的大多数典型事实不符。换言之,技术外生增长模型并不能有效支持经济增长分析领域,也无法很好地阐释先进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

三、技术内生与经济增长

面对经济增长现象无法予以科学合理阐释,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每次工业革命无不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发表了一组"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使得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从沉寂中走出,再次成为热点问题。③ 在这一阶段中,经济学家们尝试着去解决收益递减规律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矛盾,将知识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要素收益递增假设,对增长模型进行再修正,探讨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如何被经济系统内生决定,即内生增长理论或新经济增长理论。④ 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强调长期经济增长完全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特征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引入其中,并重点强调经济能否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由经济模型本身决定,即并非来自外部力量的作用,而是系统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为此,经济学家们开始围绕着外部性、研究和开发、人口变化等问题开展研究,试图重新解释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

从技术外生的增长模型来看,"索洛残余"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有效解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是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罗默在阿罗的研究思路基础上,通过内生技术进步试图克服"干中学"模型的缺陷,建立了阿罗-罗默模型。罗默拓展了外部性研究,提出了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经济增长模型。⑤ 在罗默模型的基本框架下,假定技术变化源于人们针对市场刺激而采用的有目的行动,技术的增加与人们对其投入的资源成比例,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等,有资本、劳动、竞争性人力资本和非竞争性知识存量等四种基本投入,存在研究部门、中间品部门、最终产品等三个部门,研究发现均衡产出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总存量、研究部门的设计产出率、时间贴现率和跨时替代弹性等。由于不同的中间品是对称的,存在最优增长率,且与均衡增长率有所差异。在模型中,主要采用物质资本外部性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认为知识或技术是物质资本投资的副产品,在提高自身企业生产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其他厂商的生产率,进而造成整体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为了实现最优增长率,物质资本外部性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加以解决。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方面,卢卡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采用宇泽弘文的分析框架,假设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的封闭经济中有同质性的经

---

① Sheshinski, E., "Optimal Accumulation with Learning by Doing", In Karl Shell Editors,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7.

② Uzawa, H., "Optimal Technical Change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65, 6: 18—31.

③ 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1002—1037; Lucas, R. E. Jr.,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3—22.

④ 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 年第 4 期,第 753—786 页。

⑤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s71—s102; Romer, P. M., "Are Nonconvexitie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 97—103.

济主体,物质资本积累满足新古典公式等,构建了以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程度和贴现率有关,即使人力资本增长率为零,经济增长仍然存在。此外,还发现在考虑技能水平增长的情况下,工资增长率等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这也能一定程度解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下工人工资率的差异性问题。不少学者也采用人力资本外部性来解释长期增长问题,认为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①

尽管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在现实经济中存在,并不足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这一事实。换言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虽对长期经济增长发挥着较为重要作用,但并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② 究竟什么因素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创造性破坏"这一思想,指出"确立并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转的根本动力源自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式、新市场……(这个过程)不断地使经济结构从内部发生发明,不断地摧毁旧的经济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结构。③ 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创新引致的新产品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作用也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要话题。熊彼特开始强调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开始从产品数量和产品质量两个维度来探讨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果。在产品数量层面,Judd 做了开创性研究,探讨了产品数量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④ 后续学者进一步从不同类型产品数量的角度加以深化分析,如新产品数量、质量改进型产品数量。⑤ 在产品质量方面,Grossman and Helpman 做了开创性研究⑥,后续 Aghion and Howtii 也遵循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通过假定经济中存在着劳动、消费品和中间品三类可交易商品,有三种类型的劳动且不存在劳动供给的负效应,来考察以产品质量提高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创新过程,构建了一个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内生增长模型。⑦ 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竞争性厂商的垂直产品创新。此外,也有学者从创新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同时探讨经济增长问题。⑧

人口因素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上述研究是建立在人口变化为外生变量的假定前提下,讨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进入 20 世纪以

---

① Tanura, R., "Income Convergence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522—540;Lucas, R. E. Jr., "Making a Miracle", *Econometric*, 1993, 61: 251—271;Goodfriend, M. and Mcdermott. J., "Early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 116—133.

② 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483—499; Jones, L. E. and Manuelli, R. E., "The Sources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7, 21: 75—114.

③ Schumpeter, J.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④ Judd, K. L., "On the Performance of Patents", *Econometrica*, 1985, 53: 567—585.

⑤ Romer, P. M., "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 Due to Speci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 56—62;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Endogenous Product Cycles", *Economic Journal*, 1991, 101: 1214—1229; Helpman, E., "Endogenous Macroeconomic Growth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2, 36: 237—267; Barro, R. J. and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 Boston: Mcgraw-Hill, 1995.

⑥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 1261—1283.

⑦ Aghion, P. and Howitt. P.,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1992, 60: 321—351.

⑧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 43—61; Dinopoulos, E. and Thompson. P., "Schumpeterian Growth without Scale E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8, 3: 313—335.

来,世界人口增长率呈现出“倒 U 型”特征。① 特别是从 80 年代开始,世界人口增长率开始呈现下降态势,部分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人口下滑的事实。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出发,人口下滑将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经济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且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这种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实情况的差距如何科学合理地加以解释? 从传统经济理论分析来看,不仅人口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受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根本上是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人口变化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也催生了将人口变化视为内生变量的内生增长理论。目前,关于人口如何被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讨出生率如何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模型,而出生率则主要有父母生育子女数量意愿和父母生育子女的时间选择所决定。② 父母生育子女数量意愿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点。一般假设前提是生育孩子如同投资耐用消费品,既有成本也有相应的收益。父母的子女数量越多,这种成本是不断增加的,但这种收益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Becker、Barro 等学者③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加以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反而下降,这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吻合。④ 进一步说,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父母生育子女数量在减少,那父母如何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为此,注重子女的质量,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尤显关键,⑤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则会促进经济增长,⑥这为现实和理论间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解释方案。在父母生育子女的时间选择上,父母选择生育子女的年龄将通过代际间的时间跨度,进而影响生育率。因此,在交叠世代理论基础上来构建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代际间时间跨度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探讨劳动力跨国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的动机在于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工资收入水平的高低,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将有利于国家间收入趋同。而现实生活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是长期存在的,在流动过程中容易受到较多的制度等因素约束,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的增长进程。⑦ Golar 于 2005 年发表了《从停滞到增长——一致增长理论》,系统对内生人口的新增长理论进行了论述,阐释了如何在人口下降下实现平衡增长路径均衡。同时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认为经济将收敛在稳定唯一的平衡增长路径水平,纵向和横向的创新活动相互作

---

①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数据显示,1950—1955 年人口增长率为 1.78%,1965—1970 年的人口增长率达到峰值(2.0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1990—1995 年人口增长率下降至 1.52%,1995—2000 年人口增长率为 1.32%。

② 中国在出生率的管控上,主要也是基于这两方面来制定相关政策,如提倡“只生一胎”“晚婚晚育”等政策。从一定程度上看,出生率在政策指引下也基本得以有效控制。近年来,考虑到出生率过低等现实情况,政府开始推行“全面放开二胎”等政策,其落脚点则是在提升出生率上。

③ Becker, G. S. and Barro, R. J.,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103(1): 1—25; Barro, R. J. and Becker, G. S.,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trica*, 1989, 57: 481—501.

④ 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般来说,大多数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该国的生育率反而会下降。当然,事物发展也有其特殊性,也有部分特别贫困的国家并不遵循这一规律。

⑤ Becker, G. S., Murphy. K. and Tammura. R.,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s12—s37; Becker, G. S., Glasser. E. L. and Murphy. K.,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 145—149.

⑥ Galor, O. and Weil. D. N.,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 806—828.

⑦ Barro, R. J. and Sala-i-Martin. X., “Regional Growth and Migration: A Japan- United States Compariso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2, 6: 312—346.

用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可持续内生增长。①

事实上,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来看,一旦自然资源受到约束,创新活动可能会受到限制。即若考虑不可再生资源约束,经济还能实现平衡增长路径水平吗? 这一问题也成为近年来内生增长理论的理论难题和前沿问题。Barbier 考虑到资源短缺因素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罗默-斯蒂格利茨”模型来探讨最优平衡增长路径,研究发现,创新的资源存量的约束假定将影响内生增长。② Groth and Schou 在斯蒂格利茨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不可再生资源来构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不可再生资源约束下内生增长的实现机制。③ Peretto 在常数人口增长的框架下探讨了不可再生资源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④ Schäfer 通过建立一个有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引致自然资源消耗率降低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且自然资源消耗率与人口增长率在长期均衡中呈现负向关系。⑤ 若人口稳定或下降时,R&D 部门的正向跨期知识溢出将有助于实现长期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Peretto and Valente 则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口内生变量,探讨了技术进步、自然资源约束和人口长期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⑥

四、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型中,将经济增长源泉内生化,试图从理论上说明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内生增长理论上,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仍聚焦在资本、劳动和技术知识上,制度被视为外生因素。这表明内生增长理论仍重在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配置的运行层面,而并未探究长期增长中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自中世纪以来,城镇经济活动相对活跃,生产进一步市场化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开始在欧洲凸显,但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并未同时在欧洲国家出现。在此期间,随着国家的信念差异的出现,制度开始出现分化,提出明确界定和保障财产权利制度的国家(如英国等)的经济绩效明显更高一些,⑦这才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在这些国家兴起的深层次原因。⑧ 换言之,对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积累而言,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还不如说是经

① Golar, O., “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 in Aghion. P and Durlauf. S,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5; Peretto, P. 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opula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8, 22(1): 3—42; Peretto, P. F. and Connolly. M., “The Manhattan Metaph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4): 329—350.

② Barbier, E. B., “Endogenous Growth and Natural Resource Scarcit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1999, 14: 51—74.

③ Groth, C. and Schou. P., “Can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lleviate the Knife-edge Character of Endogenous Growth?”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2, 54: 386—411.

④ Peretto, P. F., “Resource Abundance, Growth and Welfare: A Schumperer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 142—155.

⑤ Schäfer, A., “Technological Chang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Natural Resource Depletion”, *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 2014, 71: 122—136.

⑥ Peretto, P. F. and Valente. S., “Growth on a Finite Planet: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Population in the Long Ru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5, 20(3): 315—331.

⑦ 从 16 世纪开始,欧洲国家开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诺斯等指出“信念结构与存在于尼德兰和英格兰的特殊条件产生了良性结合,由此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制度演进。这种结合孕育了思想变迁,从而不仅产生了新教改革,而且产生了一种演化的信念结构,后者引致了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自由演进的行为方式。”参见 North, D. C.,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⑧ 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在同时期出现,但当前内生增长理论仍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与内生增长理论不同,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并非建立在形式化增长模型基础上,而是另辟蹊径,强调制度变迁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济增长本身。①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中的相关思想。马克思②针对经济增长的动因进行了重点分析,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本、劳动、科技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散性和社会经济运动的无政府状态将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实现稳定增长。凡勃伦(Veblem)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各种制度应是关注的重点,只有研究好制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③人类经济生活中主要有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制度和私有制度两种制度,应从制度层面来改良社会以与技术进步相匹配。Commons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当交易过程面临冲突时,只有依靠法律制度才能加以解决。④舒尔茨(Schultz)认为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并将制度进行内生化研究。⑤同时,根据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考虑制度因素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其仅适用于短期经济增长;第二类是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认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无关,但特定制度与经济增长有关;第三类是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认为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因经济增长的需求而生。经济从非均衡向均衡转变过程中,制度也会进行相应地调整,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构建了交易费用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⑥以诺斯(North)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开始在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下来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诺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产权为基础,以制度变迁为核心,涵盖产权、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认为制度变迁才是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⑦具体来看,在产权方面,通过历史的分析认为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这个有效制度中产权最为关键。在国家理论方面,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现有的组织和技术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成本极高,而国家恰好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产权保护和强制力的制度安排,进而有利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在意识形态方面,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影响交易费用来作用经济增长。由于各国国情不一,拥有的生产要素等差异性并不能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原因,制度和经济政策质量差异才是国家经济水平不同的合乎逻辑的解释。⑧Yang and Borland基于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采用超边际分析法来研究交易费用、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制度安排将

① 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④ Commons, J. R.,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acmillian, 1934.

⑤ Schultz, T. W., "Institution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68, 50: 1113—1122.

⑥ Coase, R.,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4: 386—405; 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 1—44.

⑦ 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North, D.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1981;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⑧ Olson, 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Olson, M. and McGuire. M., "The Economics of Autocracy and Majority Rule: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Use of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6, XXXIV: 72—96.

通过专业化水平带来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① Greif 提出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② 为分析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随后,Greif 以中世纪后期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制度和合约发展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研究了热那亚政治制度的自我强化的要素、内在变迁等。③ Acemoglu 通过构建一个解释经济绩效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以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为恒量,发现经济制度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④

那么,在生产要素既定的前提下,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究竟谁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此存在争议。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和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重在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而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则重在强调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当然,诺斯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分析特定阶段的历史案例基础之上,并不一定具有一般性。也就是说,制度变迁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但这也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应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⑤ 面对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诺斯和威利斯(Willis)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或技术变迁,而中间物品则是两者关系的纽带。⑥ 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均能降低交易费用和转型费用,这将有助于理解交易费用、制度变迁、技术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若追溯到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从经验事实来看,地理大发现之后,工业革命在西欧部分国家的出现,也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调整与整合息息相关。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面对理论假设缺乏现实基础而导致均衡分析被质疑和挑战等实际情况,部分学者也开始从演化分析视角来探讨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复杂关联⑦,认为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才是经济增

---

① 关于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强调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但由于很难将其构建理论模型,使得这一重要思想被边缘化。随着以 Yang、Borland 等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采用超边际分析法,构建用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这一思想又重新焕发生机。参见 Yang, X. and Borland J.,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60—482; Borland, J. and Yang X., "Specialization and a New Approach to Economic Organizatio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2):386—391; Borland, J. and Yang, X., "Specialization, Product Development, Evolu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Firm,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5, 5(1): 19—42。

② Greif,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2: 80—84.

③ Greif, A.,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Exchange: a Research Agenda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000, 4: 251—284; Greif, A.,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A.,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0481, 2004.

⑤ Ruttan, V. W.,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Hans P. Binswanger and Vernon W. Rutton Editors, *Induced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e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Matthews, R. C. O.,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986, 96: 903—918.

⑥ North, D. and Willis. J., "Integrat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4, 150(4): 609—624.

⑦ Dias, M. F. P., Pedrozo. E. A. and Silva. T. 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s a Complex Structure with Multilevel Rul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4, 24: 1067—1084; Tedeschi, G., Vitali. S. and Gallegati. M., "The Dynamic of Innovation Networks: A Switching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4, 24: 817—834.

长的主要动力。① 不少学者开始从产业发展经济史、多主体的学习过程等角度来研究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共同反馈机制。②

五、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卡尔多事实,③经济学家们往往较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总量研究,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问题。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不难发现,在一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结构变化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典型事实也表明,农业占比日益下降,而服务业占比渐趋上升。基于此,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问题。

关于结构变化问题,经济学家们最初主要进行增长结构的统计分析。库兹涅茨④通过收集统计资料,展开了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化的国际比较研究。后续,通过进一步对截面和时间序列考察,发现三次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农业部门所占比重逐渐减少,工业部门所占比重逐渐增大,服务业部门所占比重也在稳步增长。⑤ 具体来看,在截面上,通过总结 1958 年 57 个国家三个主要生产部门及其细分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份额变化来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原因,认为不同人均收入水平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也不同,进而造成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在长期趋势上,通过对部分代表性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考察,发现三大部门在时序上也存在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可以说,库兹涅茨重点关注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的增长形态,试图用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来阐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而钱纳里(Chenery)则重在关注 1945 年后的发展中国家,采用横截面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和发展政策等进行研究,认为产出主要来源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出口的增加、技术变迁和进口替代效应。⑥

无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都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与 19 世纪以前经济增长水平相比,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均工资水平、产出、消费等保持持续增长,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结构性转移成为工业革命前后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转变以及探寻结构转变的条件,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Hanson 和 Prescott 构建了一个两期两部门的戴蒙德跨代增长模型,当索洛部门单位产出满足正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时,资本和劳动将主要用于索洛

---

① 演化经济学早期注重技术创新与扩散等相关研究,被称为“新熊彼特主义”。进入 21 世纪以来,制度生成与变迁开始逐渐受到演化经济学家们的重视。面对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复杂关联,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共同演化,成为了近年来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前沿理论问题。参见黄凯南、乔元波:《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分析——基于多主体的学习过程》,《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2 期,第 161—176 页。

② Murmann, J. P., *Knowledg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Co-evolution of Firms,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e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卡尔多事实主要特点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人力资本的持续提高;资本回报率几乎恒定;劳动和资本报酬份额几乎恒定;人均产出增长率在各国的差异较大。

④ Kuznets, S., Lillian, E. and Elizabeth, J., *National Product since* 1869,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46.

⑤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Norton, 1965; 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⑥ Chenery, H. B. and Watanabe, 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Econometrica*, 1958, 26: 487—521; Chenery, H. B. and Taylor, L., “Development Patterns: Among Countries and over Tim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68, 50(4): 391—416.

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①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服务业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内的跨国分工及服务外包加剧等现实情况,Acemoglu 等通过构建一个非均衡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要素比例和资本深化的差异。② 资本密集较低的部门的就业增长快,而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快,总体行为符合卡尔多事实,其动力学也与美国的情况相似。Aghion and Howitt 通过简化模型,假定制造业部门需要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同时投入,服务业部门仅需劳动力投入,而最终产品需要制造品和服务以互补的方式进入生产函数,求解劳动力如何在两部门配置实现产出相等。③ 研究发现当长期资本劳动比无限扩大,制造业就业份额将下降,人均收入将趋于技术进步的长期增长率。

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至今,长期关注于解答卡尔多事实,其暗含的假定条件是资本和劳动的报酬份额几乎恒定。而事实上,身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其经济结构也将有所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呈现出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或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在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源加工型产业上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要素禀赋结构则明显不同,其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力相对匮乏或自然资源相对稀缺,在从事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明显优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结构也不一样,而已有的库兹涅茨事实及其多部门的非平衡增长理论并没有对此展开深入分析。④ 从经验事实也可看到,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末,最富裕的收敛群体与最贫穷的收敛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1.75 倍,经济体间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⑤ 面对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却无法成功实现转型发展与违背西方主流理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深化改革取得快速稳定增长之间的巨大实践反差,⑥Lin 首次系统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观点,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要素禀赋结构视角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的决定因素。Ju 通过构建一个无限产业的简易增长模型,提出要素禀赋驱动结构变迁理论,发现每个产业都呈现出驼峰状的生命周期,形成一个产业从出现到繁荣,然后衰退,逐渐被另一个资本更加密集型产业所替代的过程。⑧

---

① 两部门中,第一个部门是马尔萨斯部门,其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该部门是土地密集型部门;第二个部门是索洛部门,其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该部门是资本密集型部门。参见 Hanson, G D. and Prescott, E. C.,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4): 1205—1217。

② Acemoglu, D. and Guerrieri, V.,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12475, 2006.

③ Aghion, P. and Howitt, P.,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2009.

④ Herrendorf, B., Rogerson, R. and Valentinyi, A.,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996, 2013.

⑤ Maddison, A.,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2001.

⑥ 在 20 世纪末期,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成为了“华盛顿共识”的试验田,纷纷采取快速形成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休克疗法”。从实施效果来看,十几年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产值大幅下降,贫困问题、贫富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与这场激进式改革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一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改革,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充分激发,渐进式改革的制度红利也不断得以释放,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

⑦ Lin, J. 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26(2): 193—221.

⑧ Ju, J., Lin. J. Y. and Wang, Y., “Endowment Structure,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5, 76: 244—263.

六、需求因素与经济增长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认为,短期经济增长取决于需求因素,而长期经济增长则取决于供给因素。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重点从供给因素来探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而忽视了需求因素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也并未否认需求因素的重要作用。正如硬币具有两面性一样,供给层面固然重要,但总需求对长期需求路径的影响也非常重要。① 只不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需求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从各国经验事实来看,需求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因大规模进入汽车等大宗消费品时代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出现也与当时储蓄率高消费过低密不可分。

关于需求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在马克思的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便强调需求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承认萨伊定律的假设前提,非主流经济理论学者们试图在哈罗德模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认为凯恩斯假定即长期内投资决定储蓄成立。② 同时,在卡尔多、卡莱斯基(Kalecki)等人研究基础上,将需求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短期扩展至长期,强调需求导向长期经济增长,形成了以剑桥增长理论、新卡莱斯基增长理论和斯拉法超级乘数等为主的需求导向经济增长理论。

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不同,新剑桥学派在凯恩斯假定的前提下,试图建立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为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提供理论依据。卡尔多以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为基础,假定国民收入包括利润和工资两部分、社会成员中资本家储蓄倾向大于劳动者等,发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受利润率、储蓄倾向和收入分配关系影响。③ 帕西内蒂(Pasinetti)在卡尔多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放松只有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前提,假定资本家和工人均可获得利润,并将其代入哈罗德模型中,发现保持充分就业的稳定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利润率、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等。④ 罗宾逊(Robinson)主张从斯拉法(Sraffa)的价值理论出发,在卡莱斯基的宏观经济模型基础上,假定社会成员可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家的利润用于储蓄等,发现只有当经济增长率等于利润率与资本家储蓄倾向的乘积时才能实现稳定。⑤ 虽然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修正了萨伊定律的假定前提,但其关于凯恩斯假定成立的逻辑缺乏经验支持,将投资视为独立变量并不符合现实情况。

需求导向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条路径是沿着对卡莱斯基理论的深化研究展开的。卡莱斯基的增长模型以国民收入为切入点,假定存在两大阶级和两大部类,并引入政府决策曲线等,在边际分析框架下将经济增长率、生产性积累率、投资结构等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进行有机结合,研究发现生产性积累率和投资结构是影响国民收入变动和分配的关键性因素。⑥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现象、发展中国家自由化改革失败等现实情况,新卡莱斯基模型在继承卡莱斯基经济方法基础上,针对旧模型加以改进,试图对当前经济

①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 65—94.

② Kaldor, 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5—56, 23: 83—100.

③ Kaldor, N.,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yclical Fluctuations", *Economic Journal*, 1954, 64: 53—71; Kaldor, 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957, 57: 591—624.

④ Pasinetti, L. L., "Rate of Profi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Relation to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4): 267—279.

⑤ Robinson, J.,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London: Macmillan, 1962.

⑥ Kalecki, M., *Selec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ist and the Mixed Econom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Kalecki, M., Socialism: *Economic Growth and Efficiency and Investment*, Oxford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社会现象给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1990 年,Bhaduri 和 Marglin 提出了标准的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根据拉沃(Lavoie)的表述,简化的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用来反映实际利润率与利润在实际净产出中的占比、实际产能利用率与投资增长率等之间的关系。① 从模型的均衡状态来看,其稳定条件是投资要小于储蓄受到实际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被称之为凯恩斯稳定。② 但事实上,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决定的均衡并不具有哈罗德稳定性,即在参数发生变化后,经济增长率和产能利用率并不会回归到最初的均衡状态。哈罗德不稳定性使得新卡莱斯基均衡缺乏现实指导意义。为了解决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并实现凯恩斯假定与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兼容性等,Serrano 提出斯拉法超级乘数,强调自主性需求的重要性③。按照古典理论,通过假设工人获得工资并将其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家获得利润并用于引致性投资和自主需求等,将最终需求分为引致性消费、引致性投资和自主性需求,发现净产出与自主性需求之间存在一种乘数关系,在超级乘数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自主性需求增长率。虽然斯拉法超级乘数模型重新发现了自主性需求,但仅仅将长期经济增长归结于外生性自主性需求增长率并不能较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出口、政府支出等自主性需求的影响因素也是在长期中处于动态调整,④这将导致斯拉法超级乘数充满不确定性。后续,不少学者试图针对自主性需求在长期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原因进行研究。Caminati 和 Sordi 指出,实际的自主性支出并不会按照既定的外生速度增长,部分原因在于追求利润的研发和创新支出在时序上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自主性支出将有助于实现哈罗德稳定性。⑤

由上可见,非主流经济学者们针对需求导向经济增长理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近些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在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引入需求因素,来探讨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果。Matsuyama 构建了一个农业和工业的两部门模型,通过假定不同部门的技术增长率不同,在最低农业消费需求的非齐序效用函数下分析一国经济增长下的结构变迁。⑥ 虽然这能一定程度上阐释结构变迁过程,但却无法实现总量与结构的兼容性问题。为此,也有学者从多部门、多种消费品的视角来探讨平衡增长路径和结构变迁的实现问题。⑦ 除了探讨经济增长总量问题外,也有学者开始从行业层面来分析需求因素的作用效应。一国市场规模的大小,将影响技术引进的速度、创新水平的提升、技术选择的可能性等,进而对特定行业乃至于整体水平的提升带来影响。⑧

---

① 拉沃:《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Hein, E., Lavoie, M. and van Treeck, T., "Some Instability Puzzles in Kaleckian Models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A Critical Surve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35: 587—612.

③ Serrano, F., "Long Period Effective Demand and the Sraffian Supermultiplier",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4: 67—90.

④ Skott, P., "Autonomous Demand, Harrodian Instability and the Supply Side", *Metroeconomica*, 2017, 1—14; Dutt, A. K., "Some Observations on Models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with Autonomous Demand Growth", *Metroeconomica*, 2018, 1—14.

⑤ Caminati, M. and Sordi, S., "Demand-led Growth with Endogenous Innovation", *Metroeconomica*, 2019, 1—18.

⑥ Matsuyama, K.,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2): 317—334.

⑦ Kongsamut, P., Rebelo, S. and Dangyang, Xie, "Beyond Balance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1, 68(3): 869—882; Meckl,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Generalized Balance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77(3): 241—266.

⑧ Syverson, C.,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A Concrete Examp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3: 1203-1236; Lagakos, D., "Superstores or Mom and Pops? Market Size,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TFP Differences", UCLA, *Job Market Paper*, 2008; Desmet, K. and Parente, S., "Bigger is Better: Market Size, Demand Elasticity and Resistance to Technology Adoption",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5825, 2007.

七、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证据

囿于数据缺乏、指标体系标准不统一等现实因素制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相对滞后。随着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建立与完善,Summers-Heston 数据库的建立,经济学家们纷纷针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展开实证研究,这将有利于验证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既有文献梳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注国家内部增长的动力,探讨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问题;二是关注国别间经济差异,探讨国家间经济增长的趋同性问题。

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方面,经验研究不仅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也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关键因素。从既有的文献研究来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重在强调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经验研究亦是如此。在资本方面,学者们主要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维度来强调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一些文献显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设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非设备投资,这点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明显。① 也有一些文献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②但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反而抑制经济增长。③ 当然,东亚奇迹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是其主要动力。④ 在劳动力数量方面,不少学者也关注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看法不一。人口的增长将提供更多的就业人数、增强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⑤ 但也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生育率提高而带来的人口增长将会不利于经济增长。⑥ 进入 20 世纪后,不少国家的经验事实也说明,R&D 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R&D 的大量投入,将提升生产率,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增长。⑦ 但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高、产品

① DeLong, J. B. and Summers, L. H., "Equipmen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 455—502; Sala-i-Martin, X., "I Just Run Two Million Regre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 178—183; Levine, R. and Renelt. D.,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Regre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 942—963; Barro, R. J.,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2—17.

② Sengupta, J. K., "Growth in NICs in Asia: Some Tests of New Growth Theo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29: 342—357; Black, S. E. and Lynch, L. M., "Human-Capital Investments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 263—267.

③ Temple, J., "The New Growth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 37: 112—156.

④ Younge, A.,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641—680.

⑤ Kremer, M., "The O-Ring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 551—575; Brueckner, M. and Schwandt. H., "Income and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589): 1653—1676.

⑥ Hanushek, E. A., "The Trade-off between Child Quantity and Quality",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 84—117; Brander, J. and Dowrick. S., "The Role of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Results from Aggregate Cross-National Dat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4, 7: 1—25.

⑦ Griliches, Z., "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D to Productivity Growth",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0: 92-116; Chow, G. C., "Economic Reform and Growth in China",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4, 5(1): 127—152; Ding, S. and Knight, J., "Can the Augmented Solow Model Explain China's Remarkable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 37(3): 432—452; Li, H., Loyalka, P., Rozelle, S. and Wu, B., "Human Capital and China´s Futur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1): 25—48.

数量种类的不断增加等,R&D 的作用效果可能并不明显。① 在制度变迁方面,学者们分析了不同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改革,财政分权等。② 在结构变化方面,作为生产资源在部门再配置的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结构变化在区域趋同上亦是如此。③ 当然,也有学者发现,结构变动对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也存在争议,制造业结构变动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④

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除探讨其根本动力外,不少学者也纷纷探讨其他重要因素的作用效果。有些学者⑤认为地理、天气等差异会使得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水平不同。在资源禀赋方面,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到"资源红利"的影响,⑥但"资源诅咒"现象也在不少国家出现,⑦不同类型资源的经济增长效应不一。⑧在公共支出方面,支出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紧密相连,经常支出份额具有积极的增长效应,而资本支出份额则具有消极的增长效应。⑨ 还有从金融深化、国际贸易、政治制度等视角来探讨其与经济

① Jones, C. I.,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495—525.

② Nee, V. and Sijin, 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View from the Villag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0, 49(1): 3—25; Lin, J. Y.,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1): 34—51; Chen, K., Jefferson, G. H. and Singh, I., "Lessons from China´s Economic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2, 16(2): 201—225; Jefferson, G. H.and Rawski, T. G.,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8(2): 47—70; Zhang, T. and Zou, H. 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67(2): 221—240; Lin, J. Y.and Liu, Z.,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0, 49(1): 1—21.

③ Kaniovski, S.and Pender, M., "On the Structure Dimension of Competitive Strategy", *Ind. Corp. Change*, 2002, 11(3): 257—279; Fan, S., Zhang, X. and Robinson, 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3): 360—377; Vu, K. M.,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nsights from Asian Economic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7, 41:64—77; Caselli, F. and Coleman, W., "The U.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A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09 (3): 584—616.

④ Fagerberg, J.,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4): 393—411; Timmer, M P. and Szirmai, A.,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n Manufacturing: the Structural Bonus Hypothesis Re-examined",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1(4): 371—391.

⑤ Montesquieu, C. S., *The Spirit of the Law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48; Dimond, J. M. and Chen. J.,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Y: W.W. Norton and Co, 1997.

⑥ Maloney W. F. and Lederman, D.,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Resource Curse", *Journal of LACEA Economia*, 2008, 9(1): 1—56.

⑦ Auty, R. M.,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Sachs, J. D. and Warner, A. M.,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 827—838.

⑧ Sala-I-Martin, X. and Subramanian, A., "*Address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 Illustration from Nigeria", *NBER Working Paper*, No.9804, 2003.

⑨ Devarajan, S., Swaroop, D. and Zou, H.,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37(2): 313—344.

增长之间的关系。① 学者们在关注一国自身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也注意到:有些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有些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反而缩小。新古典增长理论曾指出,在技术参数和偏好相同的情况下,尽管不同国家间的初始财富水平不同,但人均收入最终将趋于同一稳态水平,被称之“非条件 β 趋同”。反之,但若控制最终稳态水平,经济富裕的国家的增速将慢于经济贫穷的国家。但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由于国家间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知识溢出等存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将会扩大。那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间能否实现经济趋同? 不少学者纷纷对此展开实证研究。从世界 100 个国家的样本数据来看,经济趋同现象并不明显。但若从发达国家来看,经济增长存在着趋同,且其速度在 2%左右。② 若对物质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加以控制,初始收入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存在“条件趋同”。③ 外资的地区分布不均、资本的跨区域配置及流动、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差异等均是影响地区经济能否实现趋同的重要因素。④

八、结论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研究中一个古老而又时髦的主题,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本文试图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梳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流变,不难发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本遵循从技术外生到技术内生、从注重经济总量到经济总量与结构并重的逻辑主线。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随后几十年里,形式化增长模型也是历经兴衰起伏,试图在不断修正中寻找新现象背后的逻辑。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学者们开始从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结构变化、需求因素等不同角度来解读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新的经济现象将助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前行和发展。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新现象的不断涌现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仍有不少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

首先,随着新技术、新危机等新现象的出现,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研判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作为当前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方向,在解释新现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注重资本、劳动力、知识和技术四要素的前提下,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单一因素、要素间的协同效应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同时,面对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平衡增长路径如何实现也将是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其次,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制度增长理论关注卡尔多事实,结构增长理论关注库兹涅茨事实。而实际上,长期经济增长不仅应关注经济总量,也应关注经济结构,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此,积极构建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相兼容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将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

① Hasan, I., Wachtel, P. and Zhou, M.,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9, 33(1): 157—170; Manwa, F. and Wijeweera, A.,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Link: the Case of Southern African Custom Union Countries”,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16, 51: 12—21; Li, D. Z. and Zhang, Q., “Policy Chioce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 Factional Politics: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Provi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8, 47: 12—26.

② Baumol, W.,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 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 1072—1085; Canova, F., “Testing for Convergence Clubs in Income per Capital: A Predictive Densit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4, 45(1): 49—77.

③ Mankiw, N. G., Romer, D. and Weil, D.,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 407—437.

④ Lee, J. Ch., “Reginal Income Inequality Varia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5, 20(2): 99—118; Xu X., “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s Become Integrated under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 116—133; Fleisher, B. M., Li, H. and Zhao, M. Q., “Huma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ginal Inequa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0, 92: 215—231.

论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再次,面对理论假设与现实情况不符的实际情况,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针对现实的解释力仍显不足。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逻辑,其暗含的假设前提之一就是个体是同质的,宏观效率则是微观效率的加总。而事实上,个体不仅本身具有异质性,个体间也具有空间依赖性。现实情况也表明,部分发达国家的微观效率较高,但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效率偏低,即市场并非总是有效的,也存在市场失灵情况。在此过程中,面对新现象时,如何实现不同层级效率优化值得进一步探索。同时,基于同质性假设前提的总量生产函数将需求因素间接引入或视为短期干扰因素被抽象掉,忽视了长期总需求的影响。现实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制约,以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等为特征的产业革命将使得生产力迎来新的变革,如何有效地构建符合当前现实的假设前提下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形成新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是未来一大挑战。

第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为蓝本,并不能有效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行动指南。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其假设前提明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为此,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成果,积极构建基于发展中国家现实情况或符合自身经济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尤显重要,我国尤其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同时,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全球持续加剧,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理论试图回答的现实问题之一。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e Path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Liu Wei, Fan Xi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New economic phenomenon requires a new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y,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is also constantly moving forward. Along with the ups and downs of world economy, what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country? Ca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hieve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a long term? These are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economic growth theory has been trying to answer under the new phenomenon. Since its birth,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as gone through ups and downs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but it still has strong vitality, trying to explain the general law of the new economic phenomen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e path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nd put forward possible directio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endogenous growth, internal logic, practice path

(责任编辑　　李　铄)